



播火者—巴金與吳朗西

另眼看作家系列之二

文字工作者 ◎ 蔡登山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許多優秀的作家，同時也是優秀的編輯，例如像茅盾、葉聖陶、靳以、胡風、鄭振鐸諸人。但就成績而言，巴金當首推第一。難怪香港文學史家司馬長風要說：「巴金以文名太高，掩蓋了他在出版事業方面的貢獻，其實後者對新文學的貢獻遠比前者重大。」（注1）洵非虛言。巴金早年便曾和朋友編輯過不少刊物，但大都與他早年的政治信仰有關，直到1934年，他參與鄭振鐸、靳以主編的大型文藝刊物《文學季刊》後，他的編輯工作與文學事業正式掛了鉤。然而真正代表他的編輯出版事業的，要到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成立，他擔任總編輯開始。

「文化生活出版社」創辦於1935年5月。起初是由吳朗西、柳靜夫婦和伍禪（陸少懿）、麗尼（郭安仁）幾人搞起來的。他們最初想模仿美國「萬人叢書」、日本「岩波文庫」的編輯方式，計劃出版一套綜合性叢書，其中「有文學，有社會科學，有自然科學，有翻譯的，也有創作的」（注2），並把這套叢書取名為「文化生活叢刊」。因為吳朗西編過《美術生活》與《漫畫生活》兩本刊物，因此順口用了「文化生活」為叢書的名稱。

「文化生活叢刊」的第一批書是許天虹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麗尼譯的紀德小說《田園交響樂》，已經用了「巴金主編」的名義，雖然當時巴金仍在日本，吳朗西這麼回憶著：「這期間我寫信給在日本的老友巴金，把我們要辦書店，出版一套「文化生活叢刊」的計劃告訴他，向他索稿，並十分盼望他回國來主持編輯工作，他同意了，我們可高興啦。巴金當時已是擁有廣大讀者的有名作家，他有搞編輯工作的經驗，他做事認真負責，有他來挑這個重擔，我對我們的事業前途是更加有信心了。巴金寫的《俄國社會運動史話》、巴金譯的《獄中記》、我編選的漫畫集《柏林生活素描》也陸續排印了。大概是8月初，巴金從日本回上海了，接著伍禪、陸聖泉、楊挹清、俞福祚也參加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文化生活出版社』便正式成立了。」（注3）

在這期間吳朗西又透過黃源的關係，從魯迅那裏約來魯迅譯的高爾基的《俄羅斯童話》，這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得到魯迅支持的第一步。之後由於原本想出版魯迅創辦的「譯文叢書」

的「生活書店」毀約，於是黃源和吳朗西、巴金聯繫後，商定「譯文叢書」轉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魯迅日記1935年9月15日云：「河清（案：黃源）邀在南京飯店夜飯，晚與廣平攜海嬰往，同席共十人」。十人即是魯迅、茅盾、黎烈文、吳朗西、巴金、胡風、傅東華、黃源、許廣平和海嬰。於是這樣，吳朗西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就同魯迅直接聯繫起來了。魯迅翻譯的果戈理《死魂靈》成爲「譯文叢書」的第一本，不到兩個月就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而據黃源回憶：「巴金後來搞『文學叢書』也是我們在南京飯店吃飯的時候，巴金要求、魯迅答應的。後來這套叢書的第一本就是魯迅的《故事新編》。」（注4）

1936年，吳朗西還協助魯迅印製以「三閑書屋」名義刊印的木刻畫集《死魂靈百圖》和《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縮印本。《死魂靈百圖》是由俄國畫家阿庚畫，培爾那爾特斯基刻。魯迅編選並作〈小引〉。是年1月8日，魯迅托黃源交三百元給「文化生活出版社」，作爲自印之經費。在以後的幾個月內，《魯迅日記》上常有「寄吳朗西信」，「吳朗西來」等，這是吳朗西向魯迅商量有關印刷等事宜。該書分精裝與平裝兩種，精裝本藍網封面，圖案和書名燙金，紙質頗佳。它是由魯迅精心策劃、錢君匋設計裝幀的。封面用的藍網，是吳朗西與錢君匋兩人跑了幾家網莊後，「最後在河南路（北京路附近）一家湖州網莊看到一種藍網子，比較中意。」（注5）吳朗西就買了一點網樣給魯迅看，魯迅看後表示同意採用。但此書是採用照相平版印製的，在印工方面還存在缺點。而後來灰紙封面毛邊的平裝本則印得比較好。而珂蘿版《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從文字的排印到托代裝訂成書，吳朗西和魯迅接觸頻繁，通力協作，終於完成。初版103冊，除部分贈書外，其餘在出版後不久就銷售一空。

爲因應讀者需要，魯迅授權「文化生活出版社」，改版重印，《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分精裝、平裝兩種，作爲該社「新藝術叢刊」第一種於10月出版。此書原來估計，大約在11月才能出書。但由於要趕緊送給在病中的魯迅看，裝訂廠也趕工。10月16日吳朗西將從裝訂廠所趕出來的幾本精裝本直接送往魯迅家，魯迅仔細看後點頭說：「這本版畫印得還可以，裝幀也美觀大方。以後的畫集就照這樣印，一個月可以出一本吧。」遺憾的是三天後，魯迅卻溘然長逝了。吳朗西回憶說：「後來知道先生第二天拿了這《版畫選集》縮印本去送鹿地亘君，在外面受了風寒，氣喘復發，以致……我真後悔，悔不該16日把書送去。」（注6）該書成爲魯迅生前經營出版的最後一本書，而吳朗西也被認爲魯迅晚年最信任的出版家。

1935年8月巴金從日本回國，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他一面主編「文化生活叢刊」，一面開始著手編輯一套「文學叢刊」。巴金早在1934年編《文學季刊》時，就曾和蘄以爲北平「立達書局」編過一套10本的文學叢書，作者主要是當時北方文壇的新秀，包括沈從文的《八駿圖》、曹禺的《雷雨》、卞之琳的《魚目集》、李健吾的《以身作則》等。「立達書局」



曾支付了三百元稿酬，然因考慮到銷路問題，書稿一直沒有出版。於是此時巴金同「立達書局」商量後，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支付給「立達書局」三百元，並將稿子取回。再加上魯迅的《故事新編》、茅盾的《路》、巴金的《神·鬼·人》等6本作品，出版了第一集「文學叢刊」共16本。之後到1949年，前後共出了十集，共160本，它成為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一套文學叢書。

在這160本作品中，作者共有86人之多，除了魯迅、茅盾、鄭振鐸、王統照等少數老作家外，主要是由文學新人構成的。他們可分為四個部分：其一為巴金在北平辦《文學季刊》時結識的一批年輕作家，如沈從文、曹禺、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靳以、吳組緇、李健吾、蘆焚、蕭乾等；其二為魯迅周圍的左翼文學青年，如胡風、周文、葉紫、蕭軍、蕭紅、張天翼、艾蕪、沙汀等；其三為「文化生活出版社」或與巴金關係較密的作家，如麗尼、陸蠡、繆崇群、王魯彥、羅淑等；其四為四〇年代西南聯大的文學青年及抗戰勝利後上海的年輕作家，如汪會祺、方敬、穆旦、林蒲、黃裳等。其涵蓋面之廣，可謂空前。

巴金的編輯方針，不僅打破「京派」與「海派」的界線，也打破了以往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研究會叢書」、「泰東書局」出版的「創造社叢書」、「北新書局」出版的「未名叢刊」，那種以社團、宗派為標準的出版原則。（注7）司馬長風就曾指出「文學叢刊」：「能夠破除門戶之見，選輯的作品包括各派的作家」（注8）。它使中國現代文學出現了真正恢宏、博大的氣象。而在當時其它出版社，大都以出版名家的作品為主，巴金卻斷言：「編輯的成績不在於發表名人的作品，而在於發現新的作家，推薦新的創作。」這在商業的考慮下，不能不說冒著很大的風險，但巴金晚年對陳思和說：「我當年編『文學叢刊』，就是靠者一股理想，那時也有人反對，說編這類書不賺錢，結果我還是編了，不但沒賠本，還銷得很好。這說明好書總是有人讀的……。」（注9）在160本的「文學叢刊」裏，我們發覺新作家的處女作竟高達36部之多，幾佔總數的四分之一。雖是如此，但巴金面對新人新作，也都是精心挑選。例如1936年9月《大公報》文藝獎金得主：曹禺的《日出》（戲劇獎）、蘆焚的《谷》（小說獎）、何其芳的《畫夢錄》（散文獎）。三部作品都由巴金之手，推向市場，其中蘆焚、何其芳可說是新人新作，而曹禺在這之前也只不過出了《雷雨》，也可說是新人。但巴金卻慧眼獨具地選擇了他們。

「文學叢刊」成為青年作家成長的搖籃，它不但為那些後來在文學史上大放異彩的作家（如曹禺、李健吾、何其芳、吳組緇等）開闢了道路；也為一些不幸如流星般英年早逝的年輕作家，留下寶貴的生命印迹。例如頗具才情的青年女作家羅淑，1936年9月在巴金、靳以主編的《文季月刊》九月號發表處女作〈生人妻〉，旋即引起文壇注目。1938年2月羅淑因產褥熱，以35歲青春年華不幸去世，留下一大堆殘稿。為了一點回憶和哀悼，為了讓「羅淑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響長留，則她的生命就沒有滅亡，而且也永不會滅亡」（注10），巴金不但編出了

《生人妻》（「文學叢刊」第五集，1937年8月出版），還懷著悲痛的心情把遺稿整理編輯，分別以《地上的一角》、《魚兒劫》為名，在「文學小叢刊」第一集和第二集出版。而年僅23歲，在貧寒與磨難中不幸溺水而死的鄭定文，他的友人王元化、丁景唐、魏紹昌等人為出版他的遺稿而奔走，巴金接受了遺稿，出了單行本《大姊》，收在「文學叢刊」第八集中。並寫下「後記」說：「我喜歡那些平凡的故事，那些瑣碎的情節，那種樸實的文筆，那種自然的抒寫，他在敘述自己的生活，訴說自己和四周的人，尤其是他四周的人的痛苦。」正因為巴金，他讓這些早逝的作家也能在文學史上留下一抹光彩。

「『文化生活出版社』始建時純繫『朋友試辦』，類似同人組織。這就意味著它不同於一般的商家、企業」（注11），基本上他們是一群文化人辦的出版社。擔任總編輯的巴金自不必說，任總經理的吳朗西是外國兒童文學的翻譯家，其他如陸蠡、麗尼是優秀的散文家，伍禪是《春琴抄》等的譯者，他們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崗位，有他們固定的收入，因此他們搞出版不圖任何私利，不要任何回報，不領任何薪、定息或紅利。他們只想多出一些好作品，發現一些好作家，對新文學的發展與壯大，文化精血的積累與弘揚，在自己的崗位上作出自己一份努力，以讓文明的火種長燃不息。這正如學者陳思和在《人格的發展——巴金傳》書中寫到當年訪問吳朗西先生的情景——「吳先生還患著帕金森氏症，說話的時候，嘴唇、手足都顫抖著。當我們之間的友誼和信任慢慢建立起來以後，一次筆者問起當年文生社同仁為什麼能以這樣崇高的理想來待事業，吳先生回答：那時，我們都信安那其。說這話的時候，吳老浮腫的臉龐舒展開來，細長的雙眼也放出了光彩。筆者頓時就感受到一種人格力量彌漫在破舊的屋內。」陳思和強調這絕不是文學筆法，那間破舊的屋子正是當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舊址，在上海西區金陵路和長樂路之間的老式石庫門弄堂楊家弄裡（現在因造高架橋已經拆遷）。而當時他突然被啟悟：這正是安那其（案：無政府主義）的只講奉獻、不計報酬的人格原則，正是正義、互助、自我犧牲三大信條在一個普通人身上的具體體現。（注12）「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為這一群信奉安那其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一個園地，是他們奉獻自己燃燒自己的一家出版社。

巴金晚年有過如此的回顧：「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寫稿、看稿、編輯、校對，甚至補書，不是為了報酬，是因為人活著需要多做工作，需要發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終保持著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給予，而不是在於接受，也不是在於爭取。所以做補書的工作我也感到樂趣，能夠拿幾本新出的書送給朋友，獻給讀者，我以為是莫大的快樂。……我們工作，只是為了替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作一點文化積累的事情。這不是我自我吹噓，十幾年中間經過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幾百種書稿中，至少有一部分



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我國人民的生活。它們作為一個時代的記錄，作為一個民族發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奮鬥的文獻，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誰也抹煞不了的。這說明即使像我這樣不夠格的編輯，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麼即使終生默默無聞，堅守著編輯的崗位認真地工作，有一天也會看到個人生命的開花結果。」（注13）

是的，由於「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二十種叢刊，近460本的出版品，為文學與文化提供了豐富而寶貴的資料。其中更凝聚了一種絕不浮躁的人文精神，一種薪盡火傳的人文傳統。而吳朗西與巴金等人有著「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紅燭精神。他們播火者的形象，更展示了知識分子生命價值的最佳綻放。

1992年2月20日吳朗西病逝上海，享年88歲。2005年10月17日巴金故去，享年101歲。兩位文學的「播火者」，雖同享高壽，但他們的離去，還是令人懷念，但願「石在，火不息」，文學能常青！

附注

注1.8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

注2.3 吳朗西〈文化生活出版社〉，《新文學史料》，1982年三期。

注4 黃源〈魯迅晚年最信任的出版家吳朗西〉，收《吳朗西先生紀念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

注5.6 吳朗西〈魯迅先生與文化生活出版社〉收《魯迅誕辰百年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

注7 孫晶《文化生活出版社與現代文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注9 陳思和〈作家余思牧和他的《作家巴金》〉，收《寫在子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注10 巴金《序跋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

注11 紀申《記巴金及其他——感想·印象·回憶》，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注12 陳思和〈孫晶《文化生活出版社與現代文學》序〉，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注13 巴金〈上海文藝出版社三十年〉，《隨想錄》，三聯書店，1984年。